

博

达

文

丛



众生自画像

——中国现代自传与国民性研究(1840-2000)

■ 杨正润 主编

本书为国家“985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成果
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资助

本书为国家“211工程”三期“中国语言文学与民族文化复兴”项目成果

博

达

文

丛

众生自画像

——中国现代自传与国民性研究(1840-2000)

■ 杨正润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众生自画像:中国现代自传国民性研究:1840~2000/
杨正润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博达文丛)
ISBN 978-7-208-08491-9

I. 众… II. 杨… III. ①自传-研究-中国-1840~
2000②民族性-研究-中国-1840~2000 IV.
K810 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7445 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季宵瑶
封面装帧 北戈工作室

• 博达文丛 •

众生自画像

——中国现代自传国民性研究(1840—2000)

杨正润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25 插页 4 字数 338,000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491-9/I. 653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导 论 /001

- 第一节 国民性:文学的描述 /001
- 第二节 国民性:哲学的考察 /010
- 第三节 国民性:文化人类学的研究 /014
- 第四节 国民性与中国现代自传 /017
- 第五节 身份的自我认定 /023

第一章 转变的契机(1840—1894) /030

- 第一节 概述 /030
- 第二节 传统士大夫的努力与营求 /036
- 第三节 外交官的体验和反思 /045
- 第四节 海外旅行者的文化调适 /059

第二章 救世冲动与乱世焦虑(1894—1911) /073

- 第一节 概述 /073
- 第二节 启蒙思想家 /079
- 第三节 “现代士大夫” /095
- 第四节 乱世众生 /111

第三章 从革命到文化(1911—1921) /123

- 第一节 概述 /123
- 第二节 身份的转换 /127
- 第三节 文化的选择 /137

第四章 个性激扬的时代(1921—1937) /158

- 第一节 概述 /158
- 第二节 革命家人格 /174
- 第三节 自我的剖析与张扬 /183
- 第四节 书斋与社会 /205

第五节 异域的体验 / 219

第六节 女性的觉醒 / 233

第五章 在“大我”与“小我”之间(1937—1949) / 248

第一节 概述 / 248

第二节 “善变”与“执拗” / 255

第三节 两种尴尬 / 273

第四节 记录时代的“自我” / 283

第六章 新生与炼狱(1949—1979) / 292

第一节 概述 / 292

第二节 政治家的自述 / 294

第三节 “反动阵营”的输诚 / 300

第四节 涅槃之路 / 305

第七章 开放时代与自我觉醒(1979—2000) / 323

第一节 概述 / 323

第二节 革命家的回顾和反思 / 331

第三节 人格的呼唤 / 337

第四节 自我价值的寻求 / 364

第五节 闪烁的星光 / 374

第六节 斑驳的脸谱 / 382

结语：“我”的中国心 / 390

主要参考文献 / 404

后 记 / 416

导 论

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也有民族性、国民人格等说法,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多数成年成员所共有的、稳定的和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又称国民性格或民族性格。美国社会学家 A. 英格尔斯(A. Ingalls)在其《民族性格》(1969)一文中将国民性称之为“众趋人格”。

国民性是从国民的个性中概括出来的共性,个性可以丰富和补充国民性,但并不能取代国民性概念,比如说日本人有危机感、美国人天性乐观、英国人保守等等,这些都是人们公认的。

关于中国人国民性问题的论说历时弥久。大体说来,这些论说沿着3个方向进行:一是用文学形象的方法描绘中国的国民性;二是用历史哲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三是用文化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

本书试图另辟蹊径,以现代自传为对象,考察中国人所描绘的自我形象和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从个别的叙述中看出国民性格的整体。

第一节 国民性:文学的描述

学术界和知识界通常是把鲁迅看作提出中国国民性问题的第一人,其实这是当时中国启蒙主义者的共同课题,鲁迅是其中论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鲁迅提出国民性问题,受到了外国传教士一些著作的影响。13世纪成吉思汗远征欧洲,罗马教皇和世俗统治者想借助宗教力量,阻止元朝大军西进,就选派多名代表和传教士出使中国,其中最著名的有13

世纪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17世纪的利玛窦。此后直到清末民初，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约有上万人之多，他们回国后用西方语言写了近千部有关中国的著作，其中除了描述中国社会及其经济状况外，也涉及中国人的性格问题。

在这类著作中，对鲁迅影响最大的是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的《支那人性格》（现译《中国人德行》）。史密斯是一位美国传教士，参加过南北战争，大学毕业后于1872年同妻子一道来到中国，取中文名明恩溥。先后在天津、山东等地传教，并从事医药、教育、救灾等慈善事业，在中国居住了54年。史密斯写过两部关于中国的书，《支那人性格》是他在上海的英文报纸《中国北方每日新闻》上发表的文章结集，1894年在纽约出版。后来被译成法、德、日等国文字，成为当时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必读书。

史密斯对中国的态度总的来说是友好的，他的另一部著作《支那的上升》肯定了中国社会的进步。1906年在他返美为教会募捐期间，受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邀请出席白宫午宴，他趁机向总统建议：把美国得到的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中国有益的事业。他为此还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罗斯福给他回了信，接受了他的意见，高度赞扬了他关于中国的著作。不久，在罗斯福总统支持下，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的议案在美国国会顺利通过。中国用这笔钱创办了清华大学并派遣大批留学生去美国留学，史密斯在这一问题上对中国的巨大贡献是不应抹杀的。

《支那人性格》是史密斯积来华22年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观察而写成的，上涉宫廷贵胄，下至平民百姓，以及古代文化和近代中国人的日常起居，他都有所思考。书中论说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有长有短，有优有劣，优者如孝顺、坚韧、节俭、勤劳等。劣者则更多，比如容貌丑陋、男子长辫、女子小脚；缺乏公共精神和公德，不守时刻、不懂礼貌、爱好嫖赌；与人相处不诚实，要面子、好猜疑、善于欺瞒；麻木不仁、缺乏同情心，溺婴杀生，见死不救，虐待动物；还很守旧，盲目迷信古代，等等。

史密斯的有些观点是入木三分的,比如他指出中国人特别好面子,只要给足了“面子”,什么事都好办。“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作戏的本能”^①，“面子”是明白中国许多事情的钥匙。中国人喜欢演戏,把自己当做戏剧里的一个角色,比如两个村庄发生纠纷,就会有人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和事佬”便会仔细考虑如何保全双方的“面子”,以平息纷争。他引用中国俗语“礼多人不怪”,认为中国的礼仪实在太多:

我们来到东方时,发现亚洲大陆上的众多人在调解人际关系摩擦的技巧方面远远胜于我们,心里充满了敬意。对于这样一个彬彬有礼而又做得如此自然轻松的民族,我实在不能妄加评论。即使最挑剔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已经把礼节升华到了一个完美境界。^②

鲁迅读过史密斯的这部著作,他指出这本书“虽错误亦多,但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③书中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也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逝世前14天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末尾,再次谈到这部著作:“我至今还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把这本书当成一面镜子,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作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才是中国人”^④。鲁迅对史密斯所说的中国的国民性是经过认真思考的。

关于国民性问题,影响鲁迅的还有一些日本作家。鲁迅1902—1909年间在日本留学7年之久,他熟悉日本文化和日本人对中国的评价。有些日本人蔑视中国人,说中国人既精明世故、又愚昧无知,说谎、肮脏、奉行多妻制度,喜欢吸鸦片……芥川龙之介是其中一员。芥川深

① 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德行》,张梦阳、王丽娟译,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1页。

② 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德行》,张梦阳、王丽娟译,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15页。

③ 鲁迅,《致陶亢德》(1933年10月27日),载《鲁迅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51页。

④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三)》,载《鲁迅全集》(第六卷),1981年,633页。

受中国古典文化熏陶,在汉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熟悉程度甚至使许多中国学者也自叹不如。他早就有来中国一游的愿望,后来终于成行,1921年他来中国3个月,游历了20多个城市。但是中国之行却使他非常失望,他的《中国游记》(《支那游记》)不时透露出这种情绪。他的第一站是上海,但是他一到上海,看到的是“一颗颗丑陋不堪的脑袋”、是“厚脸皮的老太婆”、是肮脏、落后、愚昧,他笔下的中国是:

一间耸立在阴沉沉天空里的中国式破旧亭子,一泓布满病态绿色的池水,一大泡斜斜射入池中的小便……这不仅是一幅爱好忧郁的作家所追求的风景画,同时也是对这又老又大的国家可怕且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的象征。^①

芥川的中国之行在中日两国都有较大的影响。鲁迅翻译过不少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并作过很高评价。国民性问题是鲁迅那个时代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鲁迅的观点,主要来自他对中国社会亲身的观察和感受,以及他深深的失望。1906年,鲁迅在日本弃医学文,据他自己说,作出这一影响他一生的决定,是受仙台医学专科学校一部纪录片的刺激:一些中国人无动于衷地围观自己的同胞被日本军人当作俄国间谍砍头。这一场景使鲁迅心灵产生强烈震撼,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21年12月至次年初,他最重要的代表作《阿Q正传》在报纸连载。在《阿Q正传》以及《药》、《示众》等小说和大量杂文中,鲁迅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了严厉批判。其中不少观点同史密斯和芥川龙之介等人相比,并没有多大区别,比如:

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

① 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芥川龙之介全集》,第三卷,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625页。

满足着,即一天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①

史密斯等人就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他们有根本区别:鲁迅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深刻了解的基础上的,无论是史密斯还是芥川龙之介都无法与之相比;鲁迅所批判的,诸如奴才性格、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马虎作风、因循守旧,盲目自大,以及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他们虽然也可能发现,但那只是一种表象的观察,而鲁迅却是深入骨髓,把它们看作几千年文化所形成的积淀,并把它们融入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鲁迅国民性批判中最核心的阿Q精神,包含着妄自尊大,自轻自贱,欺弱怕强,麻木健忘等看似矛盾的性格特征,却在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农民的身上统一了起来,只有鲁迅才能够如此生动和深刻地描绘出这样的性格。

这些外国传教士或作家对于中国国民性的缺点,或揭露、抨击,或挖苦、嘲讽,当然也有人感到惋惜和同情,但基本上仍是“隔岸观火”,他们没有鲁迅那样的切肤之痛;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为了“疗救”国民和社会:“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②所以,他在写作时,始终在思索:“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③这是建立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基础上对国民性的批判,痛责中包含着大爱。

鲁迅在批判中始终坚持爱国的民主主义立场,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也在改变着自己的批判话语。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东三省,中国面临巨大的民族危机,这时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大大减弱,更注意激励民族精神。1934年9月,他写道: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

①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一卷),1981年,244页。

②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1981年,508页。

③ 许寿裳,《怀亡友鲁迅》,《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153页。

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①

1925年,鲁迅又说: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②

林语堂也是一位关注国民性问题的作家,《吾土吾民》(现译《中国人》)就是其代表作。林语堂留学西方多年,对西方生活和西方文化相当熟悉,这部著作是他用英语写给美国人看的。为了便于读者接受,他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性格同西方作了广泛的比较。赛珍珠在序言中称:“它的笔墨是那樣的豪放瑰麗,巍巍乎,煥煥乎,幽默而優美,嚴肅而愉悅。對於古往今來,都有透澈底了解與體會。我想這一本書是歷來有關中國的著作中最忠實、最鉅麗、最完備、最重要底成績。”^③。這種評價也許過高,但是林語堂確實發現中國人性格中的某些特點和弱點。他認為,中華民族具有15個方面的特點,即穩健、單獨、酷愛自然、忍耐、消極避世、超脫老猾、多生多育、勤勞、節儉、熱愛家庭生活、和平主義、知足常樂、幽默滑稽、因循守舊和耽於聲色。^④他認為,中國人在本性上是屬於道家的,而在文化上則屬於儒家,上述15個特點正是儒、道兩種價值選擇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認為,中國人不太願意介入公共事務,這是因為法律缺乏所形成的一種自我保護,就像烏龜有殼一樣。中國人害怕“槍打出頭鳥”,奉行“不為人先、勿為人後”、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學是最大的智慧,以自我保存為第一要務,重血緣、重祖先和重生殖繁衍正是自我保存的核心,中華民族能延續幾千年不絕的根本原因也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六卷),1981年,118—119页。

② 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三)》,《鲁迅全集》(第三卷),1981年,145页。

③ 赛珍珠,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序》,北京:宝文堂书店,1988年,5页。

④ 林语堂,《中国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54—82页。

在于此。

林语堂还认为,统治中国的三女神是“面子、命运和恩典”。而在这三位女神中,“面子”又比“命运”、“恩典”更有势力。中国社会之所以不能有民主、法治、以至安全的交通,都是由于“面子”在作祟。^①

林语堂也十分赞美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态度:“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中国人相信“百忍传家”,“知足常乐”,不迷信身后的天堂,也不追求世俗的成就。他对国民性的认识远没有鲁迅那么深刻,他的某些发现虽然同鲁迅有共同之处,不过鲁迅是在批判、他却是玩味和赞美,他宣扬的实际上是有钱也有闲的士大夫明哲保身、不求进取的生存哲学。

还有一位对国民性的认识同鲁迅完全相反的人物,这就是被称为“遗老”的辜鸿铭。辜鸿铭生于南洋,带有西方血统,从小生活在西方、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但是他不遗余力地宣扬中国传统文化,鼓吹儒家思想,为封建文化辩护,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他的《中国人的精神》是由多篇论文组成的论文集。他认为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国人赖以生存之物,是本民族固有的心态、性情和情操,这用一个词可以概括:“温良”(gentle),“真正的中国人或不免于粗鲁,但不致于粗俗下流;或不免于难看,但不致于丑陋骇人;或不免于粗率鄙陋,但不致于放肆狂妄;或不免于迟钝,但不致于愚蠢可笑;或不免于圆滑乖巧,但不致于邪恶害人。”^②在辜鸿铭看来,中国人富于同情心和很高的智慧,非常有礼貌,追求心灵的生活,讲究廉耻和忠诚。按照他的说法,中国的国民性非常高尚,远高于西方人,这是孔子学说和儒家文化培育的结果。

辜鸿铭在观察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时候,比林语堂带有更强烈的主观色彩,在鲁迅之后,站在客观立场对国民性进行比较深入剖析的是钱

① 林语堂,《吾土与吾民》,台北综合,1976年,158—164页。

②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宋小庆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26页。

钟书。钱钟书的《围城》写于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描写的是1937年7月至1939年间的中国社会,这正是国难当头、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小说中出现的人物,不再是鲁迅笔下阿Q式的农民或孔乙己式的旧知识分子,而是一群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大学教授或留洋博士,他们穿着西装,讲话夹着英语,但却是一样的浅薄自私、麻木不仁、无聊可笑。他们忙忙碌碌,不过是为了一点虚名微利。他们爱慕虚荣,总要显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还因此沾沾自喜、自以为高人一等。他们整天盘算着,或趋炎附势、钩心斗角,或男盗女娼、心怀鬼胎,却又要装出一副仁义道德、正人君子的面孔。除了三闾大学的这群教员,书中还出现了官僚、乡绅、军人、妓女、职员、司机、工人等等各色人物,但几乎没有一个是完全正面的,个个荒唐可笑,带着人性的畸变,他们是名利场中的匆匆过客。

钱钟书受18世纪英国风俗小说和风俗喜剧的影响,高高在上俯视芸芸众生,用英国式的幽默调侃和讥笑人性中虚荣、自私的弱点,他说: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的是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①

但是,钱钟书笔下的这些人物仍然是典型的中国式的,都是病态的人物,他们身上同样可以看到民族人格中的劣根性,可以看到阿Q、孔乙己的影子。

鲁迅、林语堂、辜鸿铭、钱钟书,这是中国现代作家论析国民性问题的几个代表人物,他们的观点是如此不同:辜鸿铭倾心赞美,林语堂抑扬各半,钱钟书挖苦嘲笑,鲁迅痛心疾首!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差距并不很大,辜鸿铭同钱钟书相差不过大约50年,钱钟书同鲁迅相差也就20多年,但是他们的经历和生活环境大不相同。辜鸿铭虽然熟读中国古

^① 钱钟书,《围城·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1页。

代典籍,但是他所谓“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对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深入了解,他是用自己崇拜的儒家学说对人的道德要求演绎人生,把它当作真实的国民人格,他的看法带有强烈的理想化色彩。鲁迅虽出生官宦之家,但13岁祖父因乡试贿考案发入狱,家道从此败落,加上父亲久病去世,家庭由小康转入困顿,鲁迅因此屡遭白眼、时感屈辱。他对人心叵测、世态炎凉有切肤之痛,有人说他“猜忌多疑”,虽是一种攻击,但他确实对周围的人和事常常抱有警惕之心。林语堂也算是鲁迅的朋友,但是两人的性格相差很大,林语堂是“嘻嘻哈哈”式的人物,到80高龄也不失幽默的天性,他自称“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①他出生基督徒家庭,相信善良、怜悯、快乐之类的教义。他虽然少年穷困,但得到很好的教育,靠妻子的嫁妆留洋,进了哈佛大学,后来靠写作成了上海滩的富翁作家。钱钟书出身江南名门世家,从小生活优裕,求学、留洋一路顺利,他出众的才华为人所敬,虽然从小严格的家教使他不致把恃才傲物、目中无人时时放在脸上,不过在同行以及在众生面前总难免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之感^②。他批评的国民性主要是大学知识分子的人格,他的智慧、渊博和敏锐使他对世人的观察也入木三分,但从没有鲁迅那样的辛辣的痛感,在嘲讽的背后更多的是自得。

20世纪中,除了这4位外还有一些作家提到国民性问题,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是流传最广的一种。柏杨对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进行了批判。他说自己站在鲁迅的肩膀上,但并没有达到鲁迅的思想深度。所有这些作家都是站在自己立场对国民性格的一种观察和描述,其结论各不相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他们每个人所能接触和观察到的国民都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他

① 林语堂,《八十自叙》,《林语堂自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43页。

② 传说钱钟书把他清华大学外文系的3位老师、3位著名教授分别评为“太俗”、“太懒”、“太蠢”就是一例。

们各自的结论是否准确地反映了多数国民性的性格特征？他们的见解是否可以得到多数国民的认同？任何时代，国民总是“沉默的大多数”，无法让国民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要采取其他途径。

第二节 国民性：哲学的考察

除了作家的观察和描述以外，还有一些学者进行了国民性研究。他们试图从更客观的立场研究这一问题，他们的共同点是承认统一的国民性的存在，因为在同一个国家，全体国民有着某些相同的生存条件。

最早研究国民性问题是 18 世纪法国的一批唯物主义哲学家，其中阿尔让侯爵(Jean-Baptiste de Boyer, d'Argens, 1704—1771)在一封信中第一个使用了“国民性”(le caractère de la nation)这一概念。他说，西班牙人的性格有这样一些特点：骄傲、机灵、固执、天真、顽固、迷信、虚荣、妒忌等；英国人性格既有聪明、勤奋、慷慨、讲究规则等优点，也有粗野、蛮横和盲目的爱国等弱点。除阿尔让外，孟德斯鸠、爱尔维修、狄德罗、卢梭等人都讨论过国民性问题，他们都承认一个民族有其共同的性格，但这种国民性是怎样形成的？是物质的因素还是精神因素影响的结果？政治制度起了多大作用？对这些问题，他们有各有说法。

哲学家拉美特里专门考察过人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他的《人是机器》把人比作一部机器，影响这部机器的因素有食物、睡眠、性欲的满足程度、气候、年龄、健康状况等。拉美特里写作这部著作的目的是从唯物主义出发，从生活条件解释人性的形成，其中涉及国民性问题。比如他认为，食物对人来说非常重要，人吃什么食物，就会形成什么性格。野兽凶残是因为吃生肉，人吃生肉就会变得同样凶暴，英国人就是吃肉的时候不像法国人那样烤熟，所以英国人多少也占有了凶残的特点，并

且形成骄傲、容易怨恨以及对其他民族的轻视和强暴的性格；法国人喜欢富有营养的食物和烈酒，就形成勇敢快乐的性格。拉美特里的分析显然带有对英国人的偏见，这是英法两个民族历史上长期冲突和多次战争造成的后果。

对国民性问题最著名的论述来自孟德斯鸠。孟德斯鸠在他的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了一个“总精神”概念，它包括道德特征、思想和行为习惯，这个总精神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等共同造成的^①。孟德斯鸠特别强调气候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他在第3卷中就以气候的不同为根据分析了许多国家，其中包括希腊、罗马、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印度、中国等国国民性的特点，18世纪的法国人对中国普遍感兴趣，虽然孟德斯鸠对中国的知识只是从传教士或其他人那里得到的一知半解，但是他对中国社会却做了不少分析和评论，比如他说：“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得欲，所以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308页）“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在他们看来，服从是维持太平最适宜的方法。从这种思想出发，他们认为应该激励人们孝敬父母，他们并且集中一切力量，使人们恪守孝道。他们制定了无数的礼节和仪式，使人对双亲在他们的生前和死后，都能克尽人子的孝道。”（315页）他认为中国人聪明、勤劳、孝敬父母，但也特别狡猾。他说：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是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

^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305页。以下此书引文均依据这一版本，随文注出页码。

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
(316 页)

孟德斯鸠和许多西方传教士一样,认为中国人道德低下,特别贪婪和善于欺骗。他说:

中国人贪利之心是不可想象的,但法律并没想去加以限制。一切用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因此,让我们不要把中国人的道德和欧洲人的道德相比较吧!在中国,每一个人都要注意什么对自己有利……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316 页)

孟德斯鸠作为启蒙主义重要思想家,在法国和欧洲思想界有很高地位,他对中国国民性的论述对后代产生很大影响。孟德斯鸠把气候当作决定国民性的主要因素,这一观点为后代许多哲学家所接受,比如德国著名美学家文克尔曼、法国美学家丹纳都是用地理位置和气候来说明希腊人的性格和艺术天才的。在黑格尔的美学中,也反映了这种观点的影响。

启蒙主义者很注意启迪民智,因此关注国民性问题。在法国启蒙思想家 2 个世纪以后,中国启蒙思想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梁启超是其中的一位。自 19 世纪鸦片战争以来,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梁启超一类人物认真思考其中的原因,并且归结到国民性问题上,他的《中国之武士道》分析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梁启超也借用日本人的说法,称之为“武士道”),这部著作一开头就说:

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①

对嘲笑中国人“不武”的说法,梁启超不得不默认,但决不服气,他

^①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自序》,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 年,21 页。以下此书引文均依据这一版本,随文注出页码。